

第五部

变迁和展望

(1989—)

日本漢學史

(修訂本)

● 李 庆 著

清園



第五部

变迁和展望
(1989—)

日本漢學史

(修訂本)

● 李 庆 著

清園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汉学史/李庆著.—2版(修订本).—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201-6

I. ①日… II. ①李… III. ①汉学-历史-日本
IV.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0143 号

责任编辑 顾 雷

封面设计 王小阳

日本汉学史(修订本)

(全五部)

李 庆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81 插页 30 字数 2,978,000

2016 年 1 月第 2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201-6/K·2416

定价 780.00 元

第五部说明

这是拙著《日本汉学史》的第五部,也是最后的一部。记载的主要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情况。

第一部《起源和确立》(1868—1918),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第三部《转折和发展》(1945—1971),已经从 2002 年开始,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第四部《新的繁盛》(1972—1988)和这第五部,是拙著《日本汉学史》的后半部分。在整体上,和本书前半的三部,可以各自成书。

和前几部相比,这一部的时间跨度显然比较短,而且不少代表性的学者,在 80 年代也已经登上了学术的舞台。我之所以不把这一部分作为第四部的附录,而另外独立起来,主要是由于如下的原因:

首先,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1989 年以柏林墙的倒塌所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持续的东西冷战结构的瓦解,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整个的世界都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情势下,中日关系,尤其笔者亲身体验到的日本社会的中国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能简单地合为一体。

其次,由于世界性的信息化和所谓“IT 革命”,汉学文献的载体,研究的手段,研究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还有,由于时代的进展,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日战争以前出生,在战争中心度过自己青春时代的一代学者基本都退出了学术舞台,崛起的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的知识构造,思想意识,人生感觉,都和前代的学者有着巨大的不同,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汉学的研究体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此,我认为将这一时期,作为独立的一部,既作为本书的结束,又对未来的发展作一点展望,或许还是应该的。

这一部在整体的体系构筑和写作方法上,和前几部也稍有不同。

作为概括各个时期总体趋向的章节,即有关的重要目录的编年,本书一般只列到 1995 年。由于笔者在 1997 年已经写成了初稿,后来主要力量放到了前几部的出版上,虽说后来又对第四、第五部作了相当的补充修改,但因为考虑到由于信息化的飞速进

展,由于日本学术界的努力,这以后几年的目录,已经有比较完善的整理,我就不必再在此书中重复了。

对人物的生平事迹,由于大多数的研究者仍在世,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生的学者,他们到 20 世纪末,正处于学术研究的壮年时期,很多成果或许还没有发表,他们的业绩,要到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对他们的大多数成员和成就,仅根据笔者的寡见,在本书中作简单的介绍。这些学者中,有不少著作,是在 21 世纪出版的,笔者虽也见到,但鉴于本书的体例,只能割爱。期待着以后的研究者再作论说。

还有,在本部的论说中,有时更多地是介绍一个学科的研究问题,介绍在这 20 世纪末的时期,日本汉学界的一些群体性的动向,而不仅仅注重个人。

这都是笔者根据本书的特点所作的抉择。至于得失,有待于读者的鉴定。

关于这部书写作的基本动机、指导思想、写作方针等等,在前几部书的前言或后记中,都有所交代了,在此不赘。

从本书的动笔写作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写了这么多年,是我在最初动笔时完全没有预想到的。而在面临着历经多年跋涉,终于看到结果指日可待时的喜悦,我想我的师友、亲朋、读者,是可以和我共享的。

2001 年 12 月

2010 年初修改

目 录

第五部说明	1
第八编 面向 21 世纪的变迁和展望(1989—)	1
第一章 1989 年以后的世界局势	1
第一节 冷战的终结和面向 21 世纪的世界	1
第二节 站在十字路口的日本(日本的国内状况)	3
第三节 1989 年以后的中日关系	8
第二章 全球化进程中的日本汉学	12
第一节 趋于全球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12
第二节 变化中的日本汉学研究	16
第三章 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概况	26
第一节 考古学研究	26
第二节 先秦两汉史的研究	33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以及唐五代史研究	42
第四节 宋辽金元史的研究	52
第五节 明清史的研究	59
第四章 史学研究的代表学者	67
第一节 考古学和上古史的研究者	
(松丸道雄、秋山进午、池田雄一、江村治树、工藤元男、	
桑山正进等)	67
第二节 先秦两汉史的研究者	
(尾形勇、山田胜芳、富谷至、吉本道雅、藤田胜久、平势隆郎、	
东晋次等)	78
第三节 魏晋六朝和唐五代史的研究者	
(中村圭尔、佐藤佑治、池田温、砺波护、气贺泽保规、中村裕一、	
土肥义和、船越泰次、爱宕元等)	92

第四节	宋辽金元的研究者 (梅原郁、草野靖、岛居一康、佐竹靖彦、伊原弘、本田治、 杉山正明、植松正等)	115
第五节	明清史的研究者(之一) (佐藤文俊、川越泰博、檀上宽、谷口规矩雄、滨岛敦俊、川胜守、 寺田隆信)	137
第六节	明清史的研究者(之二) (森正夫、浅井纪、夫马进、岸本美绪等)	153
第五章	中国思想史和宗教的研究	168
第一节	思想史研究概况	168
第二节	宗教研究概况	177
第三节	先秦两汉思想的研究者 (户川芳郎、町田三郎、泽田多喜男、加地伸行、田中麻纱已、 松川健二、池田知久、关口顺、野间文史、高桥均、内山俊彦、 浅野裕一、森秀树、池田秀三、原宗子等)	182
第四节	魏晋六朝和唐代思想的研究者 (吉川忠夫、中嶋隆藏等)	216
第五节	宋明时代思想的研究者 (三浦国雄、福田殖、佐野公治、吉田公平等)	229
第六节	近代思想的研究者 (沟口雄三、滨口富士雄、有田和夫、河田悌一、山口久和等)	245
第七节	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者 (福井文雅、諏访义纯、日比宣正等)	260
第八节	道教和民间宗教的研究者 (蜂屋邦夫、小林正美、麦谷邦夫、神塚淑子、山田利明、 砂山稔、坂出祥伸、野口铁郎)	271
第六章	中国文学的研究	293
第一节	中国文学研究概况	293
第二节	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者 (小南一郎、松田稔、中钵雅量、今鹰真、石川三佐男)	308

第三节	六朝文学的研究者 (兴膳宏、林田慎之助、石川忠久、森野繁夫、清水凯夫、富永一登、井波律子、大上正美等)	317
第四节	唐宋文学的研究者 (入谷仙介、松浦友久、中岛敏夫、川合康三、笕文生、佐藤保、青山宏等)	343
第五节	元明清文学的研究者(之一,戏曲和诗文) (田仲一成、冈晴夫、传田章、福本雅一、笕久美子、合山究等)	370
第六节	元明清文学的研究者(之二,小说) (大冢秀高、小川阳一、樽本照雄、金文京、井上泰山、高岛俊男、阿部兼也、中野美代子、矶部彰、小野四平、小松谦等)	391
第七章	语言学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	410
第一节	音韵、方言的研究者 (平山久雄、望月真澄、花登正宏、古屋昭弘、平田昌司、远藤光晓等)	411
第二节	汉字和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者 (阿辻哲次、佐藤进、大岛正二等)	420
第三节	词汇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者 (高田时雄、金丸邦三、荒川清秀、内田庆市、水上静夫)	428
第四节	其他领域的研究者 (尾崎康、小川裕充、中村乔、矢泽利彦、川原秀城、渡部武等)	435
第八章	迈向新的时代——日本汉学的回顾和展望	448
后记		455
征引参考文献目录一(第一至第三部)		459
征引参考文献目录二(第四至第五部)		481
正文索引		510

第八编 面向 21 世纪的变迁和展望

(1989—)

第一章 1989 年以后的世界局势

第一节 冷战的终结和面向 21 世纪的世界

1989 年,是现代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年。

在东欧,匈牙利、捷克、波兰、东德、罗马尼亚等国,“自由化”的浪潮接连不断。1989 年 11 月,柏林墙被民众拆毁。柏林墙的倒塌,成了世界上冷战时代结束的一个标志。

1990 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总统。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正式解体。在此期间,由于东欧各国政治态势的变化,于 1991 年 7 月,华沙条约组织正式宣布解散。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欧洲,统一的进程加快了。1990 年,德国统一。1992 年 1 月,作为欧洲统一基础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并于 1993 年 11 月正式生效。徘徊了二十多年的欧洲统一进程,终于走上了较明确的通向终点的道路。

但是欧洲并不太平。多民族国家南斯拉夫,发生分裂。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势力开了战端。波斯尼亚战争的战火一直燃烧。1999 年科索沃民族纠纷中,北约以“人道主义”为由,武装介入。整个欧洲处于重组和变动中。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本国,除了经济问题以外,还存在着民族矛盾,保持国内稳定和发展在 20 世纪末是俄罗斯的主要任务。

在中东和非洲,环境和社会进步事业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人们的面前。随着

冷战的结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一度出现了和解的趋势。

在1993年9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巴勒斯坦自治的暂时协定。但和平的道路还很漫长,根深蒂固的民族纠纷,仍不断地激发出新的冲突的战火。

在中东地区,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另一种景象。

1990年,刚刚和伊朗停止了8年漫长战争的伊拉克,于8月,派兵攻占了科威特。

1991年初,以美国为中心的多国军队,对伊拉克进行全面空中打击,爆发“科威特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日本向美国提供了90亿美元的军费。战后,作为善后处理工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派军队出国。

围绕着中东的能源和战略地位,大国的势力纷争和地区的民族争斗,仍使这个地区充满了火药味。

在非洲,许多地区仍然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社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在非洲大陆,依然严峻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在冷战之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样的局面下,如何构筑新的世界格局,不仅是美国,也是世界各国在探讨和关注的问题。

1992年克林顿成为总统,开始在国内实施削减赤字,改建经济的政策。

克林顿是带领美国进入21世纪的领导人。

亚洲和太平洋,是这一时期比较平静和发展迅速的地区。

印度支那,柬埔寨在1991年,实现了和平。越南统一以后也开始了改革。1991年,中国和越南关系恢复正常化。整个印支地区,处于较安定的和平发展环境之中。1995年,越南等印支国家也加入了东盟。“东盟”国家的发展,使它成为这一地区和平和安定的重要力量。

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在80年代后期,工党政府开始采取“脱欧入亚”的政策,改革过去朝欧洲一边倒的政治倾向,使这一地区和太平洋的关系更加密切。

1996年以来,亚洲处于各种政治力量的调整过程中。

进入90年代的中国大陆,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换。90年代经济取得了持续的发展。特别是1996年,比较妥善地实现了三四年来经济调整的“软着陆”,改变了过去“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使经济的发展,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10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15次代表大会,实现了世代的交替,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宏伟

规划。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能否真正地实现和香港的“一国两制”,两岸三地的结构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同时,由于经济体制的转换和改革,也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国营企业的亏本;下岗和实际失业人口的增多;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差距;由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造成的贫富不均,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都成为未来发展的包袱。

总的说来,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在欧美和日本的经济一片低迷的情况下,中国成为20世纪末,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亮点,这一事实,使世界各国重新对中国文化加以认识的呼声再起。有的人非常乐观,产生了所谓“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说法。有的人则忧心忡忡,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就要崩溃。

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全世界的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中心。

就地球的全体状况而言,世界已将突破60亿人口,信息、电子通讯、交通工具的飞跃发展,使整个地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矛盾显得更加剧烈。和平和发展,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将越来越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课题。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的破坏,资源的大量消耗浪费等问题,已使人类面临不认真地考虑、处理好整个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类本身就将难以生存的境地。这些跨越了国界、民族、人种、宗教文化差异的现实问题,迫使人类不得不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思考、解决。

1999年10月12日,联合国宣布,地球人口达到六十亿。

总之,在面向21世纪之际,世界上依然是充满了矛盾和纷争。世界仍在动荡。

世界将在艰难的困境中,带着希望,带着沉重的负担,迈向21世纪。

第二节 站在十字路口的日本(日本的国内状况)

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处于低迷调整的时期。1989年以后世界的动荡,在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反映了出来。

一、政治领域

1991年1月,海湾战争时期,围绕着是否参加“联合国军”的问题。日本国内的政治家们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见1995年9月《每日新闻》连载的《海部内阁》)此后,在维持柬埔寨的和平、进行大选的问题上,在中东阿拉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派遣和平维持部队与否的问题上,甚至在波斯尼亚,应该不应该派遣军事人员参加的问题上,日本国内的政党,都意见对立。

1993年,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联合政权成立。1955年以来,持续了近40年的自民党一党政权结束。在政界的变动中,1994年7月,出现了自民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到来,国际上出现了“重新改组联合国”,以适应当前形势的舆论。日本国内一部分的政治势力提出,日本应该努力成为安理会成员。

1994年9月,日本副首相兼外务大臣河野洋平在联合国第49次大会上,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了这一立场。

1995年初,原来的公明党和“新党”“新生党”等,组成“新进党”。日本的政治态势完全改观。

1996年,日本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日美安保条约的再定义,提出所谓的“远东有事”的概念,使人产生对其适用范围扩大化,变成“攻击性”的条约的疑问。1996年夏秋之间,钓鱼岛问题再次成为中日关系的话题。围绕着主权之争,大陆、台湾、香港,中国人一致对日。日本则根本否定中日之间有领土问题。

1997年末,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新进党因内部的矛盾而宣布解散。形成为以小泽为党首的“自由党”和其他五个小党,这些小党的一部分又和民主党、太阳党等在1998年初结合起来,成立了民主党。另外,原来公明党的部分,则又和原来并没有并入新进党的公明党地方组织合并,恢复为独立的公明党。

1998年,自由民主党为了确保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使政策和有关法案能顺利通过,组成了保守派的联合政府。通过了“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有关日本国歌、国旗,有关对国内一些团体可实行监听等的一系列法案。1999年,为了进一步增强在参众两院的主导权,自民党又和公明党协商,形成了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的三党联立政权。

日本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依然是步履艰难。

2000 年,小渊突然病死,由森喜朗接任内阁首相。基本是维持小渊的路线。由于老的一代政治家的退出,战后出生的一代渐渐成为政界的主角,要脱出战后日本《宪法》的气蕴渐渐浓厚,要不要坚持“和平宪法”的核心——放弃战争手段,是否“改宪”,成为日本政界的一个焦点。

二、经济领域

1989 年以后,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出现了超长期的经济不景气。股票市场的低迷,不良债务的增多,消费意欲的减退,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超长期的“平成不景气”,使“日本的世纪”神话破灭。

在作为经济血脉的金融汇率领域,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磨擦,美国的克林顿政府为了解决对日贸易中的赤字问题,采取了压迫日元升值和美元的贬落,以及听任汇率浮动的政策。结果:

1994 年 1 美元=100 日元;

1995 年 4 月 1 美元=80 日元;

1999 年一度又猛跌到 1 美元=145 日元;

到年末,又增升到 1 美元=100 日元左右。

这样的变动,使主要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不堪负担。

1994 年 1 月的阪神大震灾,使日本经济重镇的阪神地区受到严重损害,这就给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日本经济造成更大的创伤。

1997 年 10 月以后,由于亚太地区金融风暴的冲击,日本经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日元和股票市场的平均指数,都跌到了五六年来最低水平。

1998 年,日本的经济出现了战后首次的负增长。

2000 年,森喜朗内阁提出了要进行“IT 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但是,实际的经济改革,还有很多课题。日本的经济仍在徘徊,终身雇用体制的打破,竞争机制的导入,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和经济构造的改革,出现了大量的失业现象,失业率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最高点。对于战后一直是以社会保障的安定为自豪的日本社会,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从“泡沫经济”的崩溃到 20 世纪末,整个日本的经济始终缺乏活力,被称为“丧失

了的十年”。

三、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

90年代以后,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政府主导的思想文化“国际化”倾向。1992—1993年,日本的学者,在东京,先后举办了三次“汉字文化圈”的国际讨论会。1993年6月,在早稻田大学,举行了以“日本的国际化和世界人权体制的创造”为题的国际讨论会。出版了《国际化和人权》的报告书。

这一年夏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 *Foreign Affairs* 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使日本学术思想文化界对于“国际化”更加关注。

1994年5月,在东京的驹场,召开了以“文明冲突还是共存?”为主题的第二届东京大学地域文化研究研讨会。

1995年1月6日,原科技厅长官高原须美子提倡“国际化应该从地域做起”(见该日《每日新闻》)。为了全面地展开世界各地文化研究的状况,1995年,以名古屋的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为基点,设立了地域研究中心,建立整个日本研究的网络。

国际化的浪潮,波及日本科学技术、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

在日的外国人,也对“国际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在日的朝鲜人研究者出版了《国际化——从脚下开始》对日本国际化过程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上述“国际化”浪潮中,日本各个地区的行政机构,进行了调整,全国47个都道府县,这十多年来,先后都设立了国际交流科,或相应的部门。各地的基层也设立了组织。出现了以“国际化”为主旨的“国际交流”的行政系统。

各大学,纷纷设立和“国际化”有关的学部,专业,比如“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律”“国际比较文化”乃至一些新成立的大学,干脆就以“国际”为名。

各企业,也纷纷向“国际”发展,甚至有“国际化食品”“国际化服装”的广告。日本的民众,实际地投入了这一过程,据日本官方统计,进入90年代,每年日本人出国旅行的人数,超过一千万。(见1991年日本大藏省《观光白皮书》39页)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日本旅游者的身影。日本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了世界之中。

其次,日本思想文化上的变化,还表现在教育和社会生活上。

在文化上,出现了脱离汉字和“书本”的倾向。

脱离汉字,是说学生不识汉字。具体的表现,是电视等节目名的变化,法律行文的改定。1995年4月通过决议,刑法由汉文风改写成通俗的现代日语,大量的周刊在几年内都改成了平假名。电视的节目名也改称。人名也如此,年轻一代的名字欧化或假名化。

脱离书本,或者是根本不看书,没有阅读和学习的欲望。在越来越信息化、电子化的社会风潮中,青年一代,乃至整个日本社会的文化构造、社会心理,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教育上,由于改变了过去的方针,强调学生的“自由”,学生的学习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变化。变化的结果,是伦理观的变迁和人生价值的改变。衍生出来的少年犯罪,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问题——少年杀人、自杀、吸毒,不断出现,无所事事,失去生活方向感的情况多有出现。

就具体的社会生活方式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也多有变化。

随着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日本的社会观念、家庭模式、社会构造,都随之改变。男女别姓、“核家庭”、家庭暴力等问题,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1997年以主张“夫妇别姓”为特点的“民法改正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97年4月,通过了“脑死”的法案。

随着日本社会的老年化,社会的老年看护体制的整備成为关注的焦点。1999年通过的有关法案,在2000年能否实施,财源能否确保,成为社会的大问题。这些,可以说都是社会生活变化的标志。

在90年代的日本,出现了一些以前没有的社会骚动。

1995年3月20日,东京地下铁道中,发生“沙林”(一种剧毒的神经毒气)事件,死亡12人,受害者达5000人以上,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社会事件。当局认为和“奥姆真理教”有关,出动数千警察对“奥姆真理教”的全国设施进行强制搜查。5月16日,逮捕教祖麻原彰晃为首的一百多名信徒。其中多有近年从日本有名大学理工科毕业的学生。这一事件,使日本各界重新考虑日本大学的教育内容。(见5月15日《朝日新闻》及这一时期的各种报纸、杂志的报导)构筑社会道德伦理和加强基本教养的问题再一次提到了社会的议事日程上来。

在社会发展到了目前水平的情况下,日本将向何处去?

人的生存价值、生存目的究竟何在？

面对着崛起的亚洲，面对着动荡变幻的世界，走过了曲折道路的 20 世纪的日本向何处去，是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现实问题。

面对着这个问题，日本社会在探索。

第三节 1989 年以后的中日关系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日关系，虽然说整体上仍处于安定的状况，但是，已经没有了邦交正常化初期的亲切感，进入了比较冷静的阶段。

先来简单地鸟瞰一下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主要状况。

1989 年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以后，世界上出现了“制裁中国”之风。对此，当时的日本海部政府，采取了一种和欧美略有不同的政策，海部首相访华，中日关系较为安定。

1990 年随着东欧的变化，苏联的解体，美国国内出现了一股“抑制中国”的潮流，日本国内也出现了相当的反响。在新闻、电视等大众传播上，时而可以看到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与此同时，一些日本的政治家在日本对中国的“日元贷款”问题上发出了要求附加不进行核试验等条件的看法，要以此作为“对中国外交”的“牌”来打。这样，在一些政客的言论中，表现出其思想深层里对中国的不信任（提出了所谓“中国扩充军备”、“南沙群岛”、“朝鲜半岛”等问题）和根深蒂固的蔑视（如对中国的就读生问题）。

由于日本战后新生的一代政治家逐步占据了政界的重要地位，他们没有老一辈那样的战争经历，再加上战后所受的教育，在思想结构上，和前一代政治家多有不同。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问题上的看法，多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1994 年 8 月，据《朝日新闻》报道，他们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询问了他们对“大东亚战争”的认识。结果 19 人中，只有 5 人承认有过侵略。但没有 1 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由此可见当时日本政界的风气。

1995 年，是日本投降 5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50 年之年。美国在该年 9 月 2 日，在珍珠港纪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大哗，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日本国内主要的倾向是强调自己是受害者，甚至有人要求美国对投两颗原子弹道歉，被美国克林顿政府一口拒绝。

1995年8月15日,村山首相在战后五十周年之际代表日本政府就历史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示愿正视历史,承认侵略,并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

当时的村山内阁,本想通过对战争表示反省、对各国受难者表示道歉的“不战决议”,但遭到右翼团体和势力的反对。组织了号称450万人的“签名”反对运动。有的(新进党)年轻议员认为“上一次战争尚未定论”(见1995年4月28日《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的记事)。

可见在新的环境中,日本政界确实有相当的势力,对于中日关系抱着不友好的态度。由于这些势力的存在,日本社会的中国观在渐渐发生变化。

1996年,4月6日《读卖新闻》第三版,报导第六次“中日民间人会议”的情况,指出,过去那种“友好”的气氛已经不见,双方进行互相的批评,原日本副总理、政界的重镇后藤田正晴颇为担心地说“(日中)关系这样任其下去,那是非常危险的”。

1996年和美国重新“定义”《日美安保条约》,提出“远东有事”日美共同行动的新意向。在苏联解体以后,这一新定义,被认为是针对中国,以中国为假想敌。(见1996年7月21日,台湾海外版《中央日报》第4版所载评论日本《1996年防卫白皮书》的报导)在日本国内存在着敌视中国的势力,是非常明显的。

8月,日本一团体在钓鱼岛建灯塔。引起中国(包括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华人的猛烈反对。

这一年,中国在台湾海域演习之后,日本政府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对华实行经济制裁,冻结对中国无偿援助等等。在这一时期,中日关系跌到了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

1997年中日政府首脑实现了互访,双方都主张加强对话扩大合作。但是,这一年,一些日本议员为了强调钓鱼岛的“主权”,登上该岛。这一行动,引起了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人民的关注和反对。双方的磨擦时而发生。

1997年日本的民意调查表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认为中国未来对日本会构成威胁。(见1997年5月17日《每日新闻》)可见,社会舆论对民众的影响,而民众的态度又反过来使舆论界更进一步地推动这样的倾向。1997年7月1日,随着香港的回归中国,日本的传媒又一次对中国和中国近代的历史进行了报道,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入。

1998年11月25日,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